

本土选择：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抑或别现代？ ——以崇明生态岛发展定位解析为例¹

庄志民

（华东师范大学 旅游学系，上海 200063）

【摘要】：上海崇明生态岛定位，从“现代化”到“世界级（国际性）”，其前置词修改本身，体现了中国区域发展定位的一种本土选择。对此选择的理解，就是不排除接受现代化潮流的裹挟，但同时，从后现代视角切入，在“上行性螺旋式回归”意义上汲取游牧农耕文明遗产所蕴蓄的养料。而这正暗合目前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别现代”的题内之义：不简单等同于前现代、后现代和现代，但却共时态地兼容现代、后现代和前现代的属性和特征；其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构成方式，好比是“长藤结瓜”式的联融。文章通过如此区域发展定位的理论探讨，目的是以“管窥见豹”的方式，推动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关键词】：崇明生态岛；本土选择；发展定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别现代

一、近 20 年来崇明规划定位的探索历程

2017 年 7 月，《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6-2040）》（以下简称《崇明规划，2040》）草案编制完成并公示，此消息在“上海发布”公众号一推出就引发广泛关注。

受此消息的鼓舞和启发，不禁让人联想起最近 20 年，顺应中国旅游投资取向动态演化^[1]的大趋势，我们在崇明未来发展定位取向方面所经历的摸索过程。

2000 年前后，笔者接受重托担任课题组长，召集一批专业涉及旅游、历史、地理和生态等的专家，协力攻关，编制《崇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经过调研分析，课题组最终落笔形成如下有关发展目标的文字：以旅游带动全县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构建理想化的“社会生态圈”理念为指导，将人文精神与自然风光结合起来，努力追求“三大和谐”（即社区人际关系的融洽、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通过有序推进、系统整合、形象突出、功能优化的筹划建设，把崇明建设成一个以不断扩大的世界第一河口沙岛为载体、以科学与美学品格的互渗互融为手段，集生态风光、时尚娱乐休闲和传统民俗文化为一体，以“清新自然悠闲游”为重点营销口号，在上海整个都市旅游总体格局中起到重要互补作用，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特色鲜明、功能多样的综合性旅游区。^①

2005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将原属宝山区的长兴、横沙两岛划入崇明县行政管辖。根据崇明县行政区域调整实际，崇明县政府对原崇明岛域总体规划纲要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崇明三岛总体规划，崇明的发展目标据此而聚焦于“环境和谐优美、资源集约利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生态岛区”。

对此定位之前被冠以的“现代化”的前置词修饰，笔者曾从推敲的角度提出不同意见，但崇明的“生态岛”定位开始高度

¹【作者简介】：庄志民，华东师范大学旅游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旅游美学、旅游资源开发和规划及战略管理研究。

凸显，这一点得到广泛赞扬与认同。

2005 年 11 月 9 日，中英企业签署了一系列经贸、科技和教育协议。其中，极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当时中英两国主要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英国奥雅纳公司签订宏观合作协议，目标是把上海东滩建设成为全球首个生态城市。随即，集世界经验之大成的崇明东滩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问世。这一生态城市规划的目标被确定为“建设一座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和谐安定、环境健康优雅的城市”。^{[2] (P26)}

希望追求卓越（一鸣惊人）却更注重务实（先谋后动）的上海，对崇明未来发展的探索仍然在持续。在 2009 年 10 月 14 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当时的崇明县政府领导介绍了崇明近年来按照市政府功能定位要求加快现代化生态岛建设的有关情况。

光阴如梭，时至 2016 年末，有报载崇明将大力实施“生态+”发展战略，探索生态文明发展新模式，建设“空间格局更加优化、生态质量更加优越、人居环境更加优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更加普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的现代化生态岛”。

2017 年 2 月 22 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崇明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公布。该规划明确，到 2020 年形成现代化生态岛基本框架，同时将统筹三岛发展：崇明本岛是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核心载体，要全面提高标准、水平和质量；长兴岛要打造世界先进的海洋装备岛、生态水源岛和景观旅游岛；横沙岛要加大保护力度，发展生态农业，成为世界级生态岛先行示范区。

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是，在崇明“生态岛”定位的前置词——“现代化”之外，开始启用另一个更为前瞻的定位修饰概念——“世界级”（国际性）。崇明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公布没过多久，本文开头提及的《崇明规划，2040》草案隆重推出亮相，该规划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和落实“生态立岛”的基本原则，坚决不搞大开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规划目标愿景是：“至 2040 年，把崇明区建设成为在生态环境、资源利用、经济社会发展、人居品质等方面，具有全球引领示范作用的世界级生态岛。”

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本文旨在从学理的角度探究，崇明作为“世界级”的生态岛，其定位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应当是怎样的？

如前所述 笔者曾经对崇明“生态岛”定位被冠以“现代化”的前置词提出异议如果按时下中国现代化的惯性路径走下去，崇明前途堪忧。”笔者当时坚持认为，应将前置定语“现代化”改为“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仍是在世界上掌控话语权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行的概念，虽然也遭遇不同意见，批评和商榷之论迭起，但因其理念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阐释富有说服力，风行全球。

比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代表作《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是个新趋向》一书中，明确指出，“我们社会的高技术越多，我们会越想要创造深厚感情的环境，以柔性平衡技术的刚性”；如果说，对科技文明生活条件的研究构成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那么可以说，从文化上把握技术进步则成了八九十年代政治、哲学及艺术的总体任务。^[3]
^(P1) 如今，人类“被”技术过度绑架，游牧、农耕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深厚感情”元素怎样得以保存，以怎样的柔性方式中和技术的刚性，是现代社会走向未来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为了化解如上问题，处于“一个从现代向后现代跨越的时代”的德国理论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提出建议，目前所要做的工作是马上“搭建后现代脚手架”。^{[4] (P32)} 当务之急，必须妥善处理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

有研究指出，现代性是以理性为依托来进行启蒙、反对宗教迷信、替代上帝进行现代社会设计的科学所遇到的观念。然而，从韦伯开始，这样一种理性的观念却被看成导致现代性陷入困境乃至危机的根源。^{[5] (P310)} 因此，注重对现代性做深刻反省，“很

多后现代主义理论依靠的是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不疑论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最基本的态度”。^[6] (P158-160)

当然，后现代主义并不完全把思维力度倾注在对现代性的解构上，其“建设性向度的另一个表征是对多元的思维风格的鼓励”。^[7] (P6) 后现代主义者很清楚，现代性被解构之后，激变的世界处于具有多种发展可能的生成性过程中，未来，一切皆可能，与其向壁虚构，不如增进思维弹性，对多元的世界做多维的探索。人类世界处于从现代性的认识论走向后现代的解释学时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同在于时代精神的转换……认识不再被看作是追求把握某个绝对的真理，知识的属性也相应不被看作是什么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与确定性，相反，认识被看作是在进行某种解释活动，它要把握的是对象的意义。”^[5] (P326)

在如此个性张扬、多元化滥觞的时代，有关区域发展定位的探索势必具有多维多向的特征。文明人类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属性的认知以及何去何从的永恒追问，在当下变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受自然环境呵护而成长的人（乃至由特定人群构成社会土壤的区域），要维系其“生”之“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时刻诘问自己并要用恰当的方式回应这样三个问题：怎样面对历史？怎样面对未来？怎样履行当下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

有鉴于此，在“前现代”“现代性”和“后现代”之外，王建疆于2014年上半年首度提出“别现代”（Bie-Morden，字面含义是“别样的现代化”）这一概念，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如今已经集辑成书。^[8]他指出，中国正在体验一种可以被称为“别现代”的独特的现代主义的形式；^[9]因为，他认为，“中国正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这里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物质基础，又有前现代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设施，还有后现代的解构思想”，是“不同于现代、后现代、前现代，但又同时具有现代、后现代、前现代的属性和特征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10]

在“接着说”的层面，我们想继续结合实际做探索的是：美好的崇明未来不是梦，梦想成真后的崇明区（含崇明、长兴和横沙三岛）的未来发展模态（逻辑）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抑或就是别现代？

从“科学就是理性不断做出假说，而这假说不断遭到批判，即被证伪”^[11]的层面看，无论是崇明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还是《崇明规划，2040》，在具体实施之前，抑或在实施的过程之中，都程度不等地具有尚未落地的“假说”之“猜想”性质。基于决策科学的审视表明，任何“猜想”都必须经历被“证伪”（立论有可能不成立或存有疏漏和缺陷）的“反驳”（审视、推敲、批评、诘难和分析）过程。如此之过程具有“思想实验室”的性质。具体到规划落地环节的实践领域，一旦出错，其成本将是极为高昂的；借助以“思想实验室”的形式出现的“反驳”，在彼此的思想交锋当中，真理将越辩越明，这样做，其实是一种规避决策（实施）风险的睿智举措。设若“假说”在经受“反驳”考验的过程中不能被“证伪”，即可做出可行性的研判。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妨围绕如上问题，对崇明生态岛的定位做一番有点反思意味的“刍议”，想来是有益无害、有助于提升区域定位决策之科学性的。

二、区域发展定位的方法论取向

关于区域发展定位，有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首先指的是异地经验。其他区域的成功发展经验，可以作为本地走向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的借鉴。异地交流往往会体现文化传播中的“势差”原理：如同古人所说，水性趋下，由于重力的缘故，水由高趋下造成势差，一般而言，高强度的文化往往因为“势差”而影响低强度的文化。^[12] (P267) 崇明生态岛定位的前置修饰词，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国际性”，其实都表明这样一种中华民族虚心的学习态度。即便在国内，各地的发展水平也不尽平衡。“势差”所使然，那些欠发达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区域，大都将先行一步的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和国家，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管理学上所说的“标杆”）。除了异地经验之外，还有一种可以称为“异时经验”的学习榜样（发展标杆）。既然作为经验总是指已经发生的事情，因此，“异时经验”在时间维度上总是指向于过去（历史）。过去（历史）是曾经的客观存在（事实）。时过境迁，“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总有一些人、一些人说的话和做的事会被历史铭记，其中那些积极的东西，就变成后人所看重的历史经验，这些“异时经验”常常被用来作为当下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的参照。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在如上语境当中经常会被奉为主臬。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想，首先由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继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被改造成辩证逻辑的方法。曾经作为客观现实的历史，蕴含着展开的逻辑；当下结构而成的逻辑，则成为浓缩的历史。换言之，历史是历时性逻辑；逻辑是瞬时性历史。在这里，一个基本的假设是，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是一致的。诚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3] (P122)}

如此的辩证逻辑方法论长期以来很受学界珍视。诸多被称为“功力深厚”的重要理论成果，大都与其严谨的理论结构基于扎实的历史文献积累之上有关。比如，目前国内管理学界极受推崇的《战略管理》教科书^②“博采众家之长”：设计学派（安得鲁斯）、计划学派（安索夫）、决策学派（西蒙）、能力学派（科斯等）、资源学派（沃纳菲尔特）、定位学派（迈克尔·波特）、角色学派（明茨伯格）……其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恰恰是学术研究“历史”形成的“逻辑”架构，由此而增进理论说服力。加之，有生生不息的工商管理案例做印证，然后，根据鲜活经验以及深化的理论思考进行持续修订，其理论的逻辑思辨力以及对于实际执行力的启迪性就是这样修炼而成的。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将区域定位（尤其是经过认真调研、缜密思考、周详统筹和反复推敲之后形诸文本的规划）当作逻辑，那么，该逻辑在来源（出处）上必须有所依傍，有着强有力的“异地经验”和“异时经验”作为支撑。

问题在于，本源意义上的发展，在时间维度上总是指向未来的。而如上所述的区域定位“逻辑”（抑或集大成式的理论总结“逻辑”），其基本时间考量则在于过去（历史）与当下（逻辑）之区间。常言道，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逻辑”构成的基础性来源设若大都取材（借鉴）于已经成为“存量”（遗产、经验、成就）的过去（历史），会有落入“刻舟求剑”窠臼的风险。彼时彼地的“他山之石”，只能在有限层面被当作此时此地“可以攻玉”的借鉴；一味照搬照套，就会重蹈“东施效颦”之覆辙。

必须在指向于过去的视角之外，回过头来向前看，着眼于未来（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增量区）。于是，另一个时间节点概念被适时引进，那就是与曾经作为实在的“过去”（历史）相对的虚幻性“未来”（愿景）。

由此，形成历史与未来这两极对应之后形成的“逻辑”——这样化合而成的逻辑，落地性更强，可执行度更高，在发展向度上显得更可持续，在决策（作为执行性“逻辑”）上更易显得左右逢源：重视传统（尤其是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在发展历程中积累的经验），但不因循守旧；着眼于未来（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却又脚踏实地、接地气。这样的方法论取向，笔者称为“羊角模式”，如象形图（图1）所示：^{[14] (P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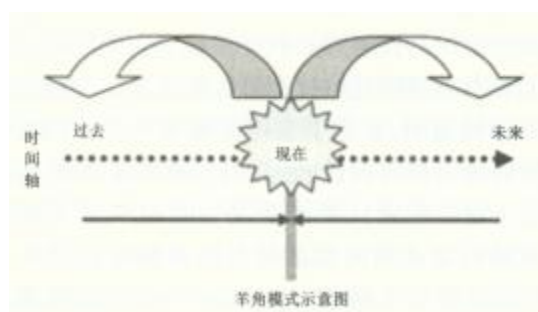


图1 羊角模式示意图

这是形成文明世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取向：在过去（历史积淀）和未来（发展愿景）的二极对应当中，对

当下的决策进行科学而艺术的价值评估，并在多元审视下进行定位选择。

因为，几千年来的人类，都始终逃脱不了这样三个形而上的终极追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谁？东方文化学（佛学）也告诉我们，人生不过就是三种状态而已：过去、现在、未来。人生不过就是三种时间而已：昨天、今天、明天。

现代人类正经历着“历史上最迅速的变化”，因而诱发人们“对世界大变动的恐惧”；为了把握事物发展的不确定，不无“假设”意味的未来学应运而生。^{[15] (P1, P17, P73)}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 1970 年就指出，未来社会的迅疾变化将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冲击，“未来冲击是一种时间现象，是社会加速变化的产物，是一种新文化强加于旧文化而引起的”。^{[16] (P11)} 在“激变的时代”，大写的人要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过去所显现的一切作为事实存在已经不可更改，而未来却是一个未知数，唯有如此，才存有发展的机遇，才为大气盘旋的创造留下最为广阔的空间。显然，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未来学观念。

思来想去，继往开来的必然选择就是：当下的“我”要到何处去（未来），取决于过去的影响力和未来愿景勾勒间的生成性（始终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博弈。

如果说，“现在”的我们所经历的正是现代化的大潮，在这之前的“过去”则对应于前现代，那“未来”呢？在西洋的学术语汇中指的是“后现代”，中国学者王建疆别具一格地提出，应当是本土属性和特征更加凸显的“别现代”！

崇明“生态岛”的国际性/世界级定位，需要超越“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经典哲学方法论，也许可以用“羊角模式”作为基准视点，从过去（作为存量的历史）-未来（作为增量的愿景）与逻辑（作为当下的决策方略）相统一的方法论取向上进行诠释。

需要做说明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西洋发达国家的成功历史经验，常常被作为我们确立未来愿景的参考。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崇明生态岛的定位，先定位于“现代化”，继而提升为“国际性”或“世界级”的部分原因。我们在进行崇明发展未来定位探索的开始阶段将“后现代”作为对标的参照系，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如果说，未来愿景（增量）的勾勒需要我们“仰望星空”，过去历史（增量）潜能的发掘则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不“仰望星空”，就不能在对标和比照中对过去（历史）的存量经验做“扬长避短”的价值研判，传统会成为背负的包袱，或者出现“买椟还珠”的笑话；不“脚踏实地”，就难以将哪怕在“他山”行之有效的他者经验融入本土化的孕育和催生土壤里，未来愿景有可能会变成“一现”之“昙花”。

正是在这样的经过微调的辩证思维方法论意义上，我们对于“别现代”理论采取积极响应的态度。王建疆指出了“中国的别现代属性”在于“时间的空间化”，意思是说，在中国，当下的现实就是“现代、后现代与前现代共时存在”。^[10]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区域定位的睿智选择，就是要在“时间的空间化”的多元（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举语境下，催化和孕育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别现代”路径！

三、除了“上行性螺旋式回归”，还有“长藤结瓜式的联融”

如上诠释需要建立在历史学和未来学二元一体的综合基础之上，即，需要从“螺旋式回归”的意义上，审视第一浪潮文明（作为“正题”的前现代）、第二浪潮文明（作为“反题”的现代化）以及第三乃至第四浪潮文明（作为“合题”的后现代）这一人类历时性地走向未来的层叠累创过程。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 1980 年有过分析，他认为，“第三浪潮文明生来有着许多特点”；“第一次和第三次浪潮文明之间，比起它们与第二次浪潮来，似乎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这种奇怪的一致性，将使今天的许多第一浪潮国家，可以不搞全套照搬，不完全牺牲它们的文化或者不首先通过第二浪潮发展阶段，就带有

第三浪潮文明的某些特点”。^{[17] (P411-412)} 对此, 笔者 1995 年发表的《后工业文明与回归自然的旅游——关于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的文化思考》^⑧中有过响应性分析: 作为在当时西洋人看来的第一浪潮文明国家, 东方中国有可能跨越第二浪潮文明, 直接进入新时代, 换言之, 前现代文明未经过西洋意义上的充分现代化这一环节, 有可能直接进入与整个世界的第三、第四浪潮文明形态同步的时代。

现在看来, 对于崇明这样有着丰富的第一浪潮文明遗存的区域, 阿尔温·托夫勒有关“不全套照搬”现代化历程之所有步骤的见解, 尤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原本并不起眼的“三农”其实是个广袤无垠的全域天地, 其内在潜力无穷, 远未达到深刻被认知的地步。那些经济生活严重落后于城镇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区域, 设若具有本真自然抑或特色民俗社会资源, 完全可能“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将清真的自然山水和淳朴的民俗风情作为最独特的生态“卖点”, 适销对路于那些亟欲逃脱钢筋混凝土森林而“返璞归真”的人们。拥有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桂冠的崇明定位“生态岛”, 着实是以资源(存量)为基础、以市场(增量)为导向的睿智之举和上佳之策。

我们在此提出“上行性螺旋式回归”之取向, 基本意图是, 第一浪潮文化(游牧农耕文明)可以跨越第二浪潮文化(工业文明), 直接进入第三乃至第四浪潮文明, 并在现代服务业占据产业结构主导地位、“以休闲者为中心”^{[18] (P35)}成为社会主流形态的时代大行其道。诚如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样, “怀旧/恋乡……可以是对于我现在所处位置的一种积极应对……让自己重新获得在他乡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和确定性”。^{[19] (P73)}

在“上行性螺旋式回归”视角下予以审视, 如果说, 第一浪潮所凸现的是自然和传统的“深厚感情”, 第二浪潮所张扬的是城市和时尚的“高技术”, 第三浪潮则在“否定之否定”中, 重新审视和评估第一浪潮文化, 进而从复归意义上重建乡野与都市的和谐、温馨情韵与技术魔力的和谐。在中国, 诸如崇明这样的具有前现代资源优势之区域, 有可能以“上行性螺旋式回归”的方式和路径, 跨越式步入与世界取同一层级步调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如果说崇明的过去主要是第一浪潮社会, 主要是个农业县, 未来向何处去? 是亦步亦趋地追赶现代化浪潮, 首先争取与本级市区同步, 并在行政建制由“县”变“区”之后, 更近一层, 在产业发展高度上迈入眼下城区的“现代化”方阵, 还是存在另一种可能, 就是在定位上采取超越发展战略, 跨过通常意义上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 进入更为注重泛生态(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融合)平衡的后工业(后现代)社会呢? 或者, 采用“别现代的思维方式”, 那就是在事物发展到高潮时(比如时下中国内地方兴未艾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在“如日中天时, 突然停顿, 另辟蹊径”, 实行“跨越式停顿”战略?^[10]

我们非常赞同王建疆“别现代”视角下的“跨越式停顿”观点, 那就是, 有鉴于“跨越式发展一味追求增长的思路正在被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所矫正”, “跨越式停顿正在通过世界无水日、无车日等仪式而得以表现和强化”。^[10]同时, 需要补充的是, “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恰恰是西方社会力主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潮所体现的基本立场。如前所述, 本文所提出的崇明未来发展定位必须适时绕过“现代化”主潮的冲击, 实施真正凸显“生态”本位的后现代跨越式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样的前瞻性发展跨越, 是在大家都一窝蜂地挤在“现代化”的快车道上的时候, 果断叫停(其实包含着“跨越式停顿”的“别现代”内涵), 倡导张开后现代主义思维弹性的翅膀, 大胆假设多种发展可能性, 看看到底哪一种更科学抑或更艺术, 然后, 择善而从。

换句话说, 该出手时就出手, 到一定的时候, 勇于对“现代化”说“不”, 是想通过“草船借箭”的方式, 借鉴后现代主义来做两件事情: 其一, 解构(批判)和反思现代性; 其二, 通过“上行性螺旋式回归”的方略来发掘前现代(游牧农耕社会)文化的某些足以帮助我们继往开来的宝贵资源。

崇明生态岛的“现代化”前置词在崇明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时段结束后戛然而止, 再往前走, 就要根

据《崇明规划，2040》中的“世界级生态岛”思路来走了。或许，这也正体现了王建疆所说的“跨越式停顿”的“别现代”取向。

按照王建疆对“别现代”内蕴的注解，首先，如前所述，至少对崇明而言，这是对正在腾飞的中国之现代化进程提出“跨越式停顿”的建议；其次，是对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别样综合。

王建疆指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等时间阶段共存于同一空间是别现代的特质之一。这种时间的空间化导致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和谐共谋和对立冲突，构成了别现代的内在张力”。^[20]就后者而言，“别现代”就像“长藤结瓜”：藤蔓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生长而延长，长藤上的瓜蒂也随之渐次出现；在当下，“历史”形成的时间“长藤”上资历不等的“瓜蒂”顿时（共时态）展现在我们面前。若从区域发展取向上看，这就形成除了“上行性螺旋式回归”以外的另一种定位方式，那就是“长藤结瓜式的联融”。

崇明生态岛建设，必须充分利用其前现代以来历时性形成并积淀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遗存，也必须接受现代化浪潮（比如高技术成就、便携的公共服务配置等）的裹挟，更必须汲取兼及“解构”和“建构”性后现代思维范式的合理成分。如此体现系统多层面、多要素整合的“联融”，事关未来崇明可持续发展执行力是否真正由可能变成现实，其重要性不可低估。

从表象上看，“上行性螺旋式回归”与“长藤结瓜式的联融”截然不同。其实，彼此的内里还有相通的地方。如果是单向度的“回归”，其所指向的是脱离现实（当下）、更与未来（愿景）无关的“过去”，那么，这与“长藤结瓜式的联融”的差异是巨大的。因为，前者是向后看，缅怀先祖功德的结果是坚守基业，拘泥于旧制而不敢有所突破，更遑论锐意创新；后者则注重向前看，而且在时间流程上，经历层叠累创的积淀和融汇过程，所追求的是有所依傍的与时俱进。但是，如果“回归”是“上行性螺旋式”，情形就很不一样了。所谓“螺旋”，意味着事物运动的方向始终围绕着某个“主核”，发展的轨迹因为有“主核”的磁力吸附而“万变不离其宗”，传统文化的精粹必须得到薪火相传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如此“螺旋”随着时间轴经历着渐次提升的过程，即便是传统中的永恒经典，也必须在与与时俱进中不断完善自身，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新瓶装老酒”。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目前风头正劲的城镇化（工业化）浪潮滚滚而来的态势下，崇明未来发展定位于“生态岛”，至少在法规层面，使得这片上海最大规模的绿洲避免遭遇单纯意义上的“现代性”（工业化）所可能酿成的“善意”破坏。

无论未来的崇明怎样变，生态、绿色、环保、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初心”不能变！“回归自然”和“回归传统”，这是人类走向未来的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强烈的诉求；当然，回归也不是一味向后看、开倒车，而是在“上行性螺旋式回归”意义上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因为，“螺旋”式回归的主核是宽泛层面被诠释的“生态”！

属于西方世界话语体系的“后现代”思潮流行，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针对工业化初期一切“向钱看”（缺乏社会生态责任感、过度追求利润）的弊端而力主“解构”纠偏。生态是“解构”的利器，更是“建构”的良方！当然，回过头来说，“螺旋”之所以不是原地打转，而具有“上行性”的属性，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其在青山绿水之间“记得住乡愁”般地“回归”的同时，不排斥现代化潮流中某些借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的东西，比如，与“深厚感情”相联系的“高技术”。即以旅游业发展为例，“互联网+”就是一种高技术，不能设想，未来的生态崇明会拒绝采用这样的高技术（比如可再生能源技术方案）。因此，前现代（传统/过去）、现代以及后现代随着历时性流程展开的这些时代属性和特征，就可能以“长藤结瓜式的联融”方式，出现在崇明大地上。

四、除了自然生态，还有社会生态

响应上位规划的“国际化大都市”抑或卓越的“全球城市”之愿景召唤，作为本土选择的崇明生态岛究竟向何处去？

既然已经把对标的基准定在“国际”和“全球”的“卓越”尺度上，我们就有必要放眼世界，来看一下，文明世界认同的

“生态”（文明）究竟有着怎样的含义。

有关研究表明，如今，人们的视域，已经从单纯的自然生态，转向以自然（青山绿水）环境为本底，加上醉心于山水间、安居乐业且和睦相处的人群之社会生态。基于此，社会生态学从“协调发展论”出发，推崇“三大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的绿色文化和绿色美学观产生了。^{[21] (P12, P118, P212, P291)}从文明史演化看，古老东方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老庄哲学力主“道法自然”，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推崇“自然为人立法”（人向自然生成）；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则另辟蹊径，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迷醉于人为自然立法（自然向人生成）；当代生态伦理主张“人为自身立法”，其前提是“人必须首先成为人，只有首先成为人，他才能按照自己的人性为自己制定普遍的道德法则”。^{[22] (P311)}那么，在生态文明的时代，如何使现代人重铸人性，成为《易经》中所说的“与时偕行”，能以自律的方式关爱大自然（包括在自然中生存的人自身）的真正的人呢？这从风头正劲的前沿学术思潮“生态批评”中可瞥见一二。有研究甚至提出极为宏阔的泛生态文明观，认为：“天、地、人、神和谐共在的整体生存境界是一种美的境界，审美化生存是重建家园，实现美的生态文明境界的必经之路。”^{[23] (P284)}

如上不免有些让人读起来感到枯燥的理论反思，有助于我们在实践领域做决策，为区域发展做科学而艺术的定位。时下的人们非常看重崇明的植物和动物学意义上的绿色生态，当然，这是以东平森林公园、东滩观鸟乃至酝酿中的生态城等为支柱、做拓展和铺陈，进而形成生态岛项目架构的。如此发展取向，相比于漠视、轻视乃至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言行而言，是巨大的进步。但又需要关注的是，崇明除了绿色自然生态，还有什么？还有象征绵绵不尽之生命力量的绿色社会生态。在社会和谐的麾下，崇明有着越来越稀缺、但越来越珍贵的符合绿色生态协调法则的社会民俗文化系统。这是极具中国特色和江南韵味的崇明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泛生态图景。这是崇明定位多元杂糅的所谓“别现代”属性和特质的基础。遍览在历史中建构的崇明三岛大地，有建筑文化中的环洞舍式民居、一窗一阑式民居，尤其是三进两场心四厅头宅沟式民居等；有民间艺术中的崇明派瀛洲古调琵琶、民俗文化中的崇明扁担戏和崇明灶花；还有饮食文化中“名扬江北三千里，味占江南第一家”的老白酒、甜包瓜、金瓜、白扁豆、山药、老毛蟹、“水中人参”鳊鱼、刀鱼、凤尾鱼等；另有在中华传统医药学中有一席之地的崇旋复（草药）；此外，不可忘记崇明发展史上的难忘篇章，一种和农场相联系的知青垦拓文化形态……凡此种种，是否已经被薪火相传的种种措施有效保护和传承，走向新而又新的崇明未来？回答并不乐观。《崇明规划，2040》确定了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核心指标体系，从环境质量、生态空间、水资源、生物多样性、气候与能源、产业体系等方面明确了核心控制指标，引导、监测、评价崇明生态岛保护、修复与建设。同时，对开发边界提出了“瘦身”的总管控要求。所有这一切，无疑非常重要且正确。此外，规划也提出：切实转向“生态化的生活生产方式”，即牢固树立生态保护理念，积极引导居民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向绿色低碳、文明健康方式转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该规划也有关于“乡村地区缺乏关注”等存在问题的表述。如果“生态岛”的建设在“三农”方面重视不够，规划文件所提出的稳妥推进“生态+”发展战略，积极推进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发展，就有落实不完全到位的可能。如前所述，崇明岛的前现代文化（三农）遗存丰富，如果自然湿地保有率、森林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水面率都达标了，但是，作为崇明的绿色文化和生态伦理基础的乡村地区仍处于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地位，栖居其间的人（本地居民，当然也包括外来人口，尤其是休闲社会当中蜂拥而至的游客）及其社会文明（大写的人之人性）提升没有得到相应的规划体现，那么，崇明的泛生态大地总体评级将会逊色多少？作为华夏“人文山水”崇明岛版的“生态”，理所当然地要求我们在自然和社会的复合概念上得到合理诠释，进而落到实处成为“别现代”的文化人类学模本。这样的话，到了2040年，作为“卓越的世界城市”的上海，其崇明生态岛的“世界级”才名副其实。

五、崇明国际性生态岛定位的“别现代”路径

显然，笔者在对崇明生态岛做定位探索时导入的“后现代”视角，已经扬弃了单向度的“解构”成分，从“螺旋式回归”的层面注入了某种“建构”抑或“生成”的成分。如此有关区域发展定位的“建构”，是对前现代资源禀赋、现代性潮流裹挟和后现代理想召唤的综合响应。这样“长藤结瓜式的联融”意味的综合响应，如今有了体现中国话语创新意义的“别现代”表述方式。

在后续研究上，崇明国际性生态岛的“别现代”未来发展取向，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尊重历史，增进民族文化自信，尊重传统，睿智发掘本土化的前现代资源潜能。就崇明而言，其游牧、农耕时代文化遗存，所谓的“三农”（农村、农民和农业）不应当简单当作“问题”包袱背起来。按照浙江宁波东钱湖的经验，从新农村建设入手，直到国际旅游度假区创设成功，其所走过的，正是一条以“三用”新思路尝试解决“三农”问题的创新之路：用景观的概念建设农村；用旅游的理念经营农业；用人才的理念培育农民。^{[24] (P127-150)} 这一点本文分析涉及颇多，于此不赘。

第二，从后现代视角解构“现代性”，扬长避短，拾遗补阙，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意义上睿智地补上现代化这一课。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解构以及对未来社会向何处去的尝试性建构，可以作为包括崇明在内的乡野“三风”（风景、风情和风物）资源禀赋上佳的区域未来发展定位的重要参考。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在前现代属性和特征显著的区域，如何接受现代化的洗礼。颇受垢病的现代性，很多指的是工业革命初期所存有的缺憾，比如，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经济）难免会有（环境）污染；于是，“先污染后治理”成了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俱往矣！一种“富有远见”的新经济模式正在改变世界。杰里米·里夫金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因为，通过“可持续发展改革和可再生能源布局”，同样可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时代即将结束；可再生能源、配置微型发电厂的建筑物以“收集可再生能源”等五大支柱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柱。^{[25] (P24, P32)} 如此提升和转型了的、与“生态世纪”的绿色、低碳、环保相关联的现代化，显然是《崇明规划，2040》的题内之意。关键是，这样的“高技术”怎样与“深厚感情”相结合，怎样通过人性化的方式得以展示，这才是一篇更值得泼墨书写的“大文章”。崇明，需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来补上现代化这一课。在工业革命 3.0“集结号”已经吹响、工业革命 4.0 元素滥觞的时代，我们的思维绝对需要超越工业革命 1.0 和 2.0！

第三，为了避免帮助我们“攻玉”的“他山之石”不接地气、水土不服，别无选择的选择，也许是站在中国土地上，面对崇明的现实情境，探索走一条国际性生态岛的“别现代”道路。这又遇到了中国自 20 世纪“五四”运动以来始终纠缠不清的跨文化难题：究竟如何处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就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看，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学界，出现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须是我”，持有此立场者“体现出对本土学术文化传统的坚持”；也出现过以胡适代表的景仰“外国更圆的月亮”者，其基本倾向是“对外来学术文化的开放态度”。^[26]到头来，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显得影响更为广泛，这是张之洞在他的专著《劝学篇》里提出来的。当然，实际上，“体-用”如何交融问题，在中国一直没能真正得到有效解决。现代性、后现代，作为思维方式，来自西方语境，对站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不失为一种启迪，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但是，在将作为舶来品的思想文化成果落到实处方面，还是不可避免会遇到文化类型有别而出现的排异现象。在中性意义上被看待的中国前现代习惯文化势力，会在现代乃至后现代的文明演化过程当中，有着顽强的生存表现力。因此，在有关农村城市化的研究当中，黄郁成尝试从跨文化视角切入，思考“中西”文化的“体用”冲突和融合问题：当中国开启城市化道路之时，便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在根深蒂固的礼治秩序作用下，形成了“礼制市场”的路径依赖。^{[27] (P280)} 在这里，“礼制”是前现代遗存，“市场”则是“现代性”体现（从成体系的观念形态之来源上看属于舶来品）。市场化条件下迅速成长的中国城市，由于受传统“礼制”文化的影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城市为主体的等级市场”。黄郁成有关于“礼治市场”的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是否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姑且不论，但其从文化交融的“地球村”视野出发，凸显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市场本身的前现代“礼制”及其当代表现，这样将国际视野和本土实际相结合的努力是值得高度嘉许的。我们借此想表明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有关崇明生态岛定位的本土选择，无论怎样借鉴“他山之石”，一定要落到实处，切中肯綮。例如，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礼制”属性和特征，要将崇明生态岛建设进行到底，不可规避的一个现实就是，怎样将自然生态（更多涉及硬件）治理、管控和维护与社会生态（更多涉及软件）的维系、培育和升华，以一种“别现代”的张力方式结合起来。我们目前看到的《崇明规划，2040》，多少存有前者分量重、后者分量轻的缺憾。也就是说，我们注意到彰显“现代的文化”，而现代文化“在其基本原则上是技术型的”。其实，还要关注后现代视角下

的前现代涉及人的“深厚感情”属性，因为，“后现代的文化则是人格化的”。^{[3] (P36)} 这里所提及的“人格化”，与褒贬无关，可以作为“人性、人伦、人品、人群”之类文化概念的集合体来理解，它们已经沉淀在“集体无意识”层面的华夏文化里。对于中国而言，其如同参天大树深扎于土壤之中的根系，是很接地气的！“别现代”的《崇明规划，2040》在执行过程中，如

何睿智处理泛生态意义上的物与人、经济与社会、科技与情感、自然与文化等诸多关系间的系统协调和综合平衡，如何因地制宜实施生态补偿举措，^[28]也许是规划落地过程中逐渐需要解决的问题。

注 释：

①引自《崇明岛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2001年9月通过上海市科委组织的专家评审。

②例如，弗雷德·R·戴维：《战略管理》，李克宁译，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多次修订，长期以来在国内各大高校 MBA 项目中被使用，2005年第10版问世，次年即推出中文版。

③《旅游学刊》1995年第5期，后收入庄志民：《旅游经济发展的文化空间》，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 [1] 苏建军，孙根年. 中国旅游投资规模的动态演进与分布差异[J]. 旅游科学，2017，（1）.
- [2] 上海实业东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编. 东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 [3] 约翰·奈斯比特.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是个新趋向[M]. 孙道章，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 [4] 彼得·柯斯洛夫斯基. 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5] 陈嘉明.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6] Christopher Butler. 解读后现代主义[M]. 朱刚，等，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 [7] 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王成兵，译. 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1.
- [8] 王建疆. 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间跨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9] 基顿·韦恩. 从后现代到别现代[J]. 上海文化，2017，（8）.
- [10] 王建疆. 别现代：话语创新的背后[J]. 上海文化，2015，（12）.
- [11] 卡尔·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M]. 傅季重，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_
- [12] 任继愈学术论集自选集[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4] 庄志民. 旅游经济文化研究[M].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
- [15] E·柯尼施. 未来学入门[M]. 孟广均，等，译.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
- [16]阿尔温·托夫勒. 未来的冲击[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 [17]阿尔温·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M]. 朱志淡,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 [18]甘哈曼. 第四次浪潮[M]. 林怀卿, 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4.
- [19]基斯·特斯特. 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M].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20]王建疆. 时间的空间化与美学功能[J]. 当代文坛, 2016, (6).
- [21]郭因, 等. 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通论[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 [22]曹孟勤. 人性与自然: 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23]王茜. 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24]朱至珍, 庄志民. 难得湖途——休闲旅游业的东钱湖之路[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 [25]杰里米·里夫金.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M]. 张体伟, 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 [26]张弘. 20 世纪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初析[J]. 上海文化, 2017, (8).
- [27]黄郁成. 农村城市化: “礼治市场”的路径依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28]陈海鹰, 杨桂华, 曾小红, 李鹏, 游长江. 旅游生态补偿标准: 类别构成及核算模型[J]. 旅游科学, 2017, (4).